

## 清华园——我心灵的归宿

○ 施能民（1958 届电机）

清华园，中国近代高等学府的翘楚，是多少莘莘学子仰慕的圣地。65年前的1953年，我从福建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自那时起，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便深深刻在我的心扉。

在清华学习期间，我曾担任政治辅导员三年。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受到清华教书育人本领的历练。留校任教期间正值整风反右运动，我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号召向党敞开心扉、尽述条陈，但最后却因此枉得处分，被开除党籍、团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国家之不幸在我个人命运上的体现，更没想到后续坎坷的路程将会延宕22年。

1960年，我背负着严重政治问题被清华大学清理出来，来到福州大学任教。此时，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形势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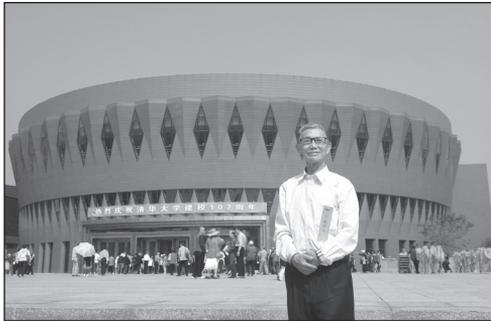
严峻。福州军区司令部承担首要防御的任务，我被其急需自动控制技术人才的科研部门选中，但因为我的政治问题只能作为编外人员从福州大学借调使用，无论在粮油供应、政治待遇，乃至出操排队等方面都受到低人一等的另类待遇，但我始终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古训鞭策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勤奋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先后荣获军委工程兵科研三等奖两项，立三等功两次。

1965年，借调我的国防科研单位调往京城，我再次因为政治问题被刷下。虽然我失去了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良机，所幸的是我仍能回到福州大学教学岗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被下放到福建省偏远的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谁能想到，提了几条意见，竟然由“政治问题”发展成为“政治历史问题”。

在山区，由于缺乏体力劳动的技能，我的劳动工分仅是普通社员的一半，分的口粮也只剩一半。善良的生产大队长看到此情况，就安排我利用生产大队的办公小房办起了小学。白天教适龄儿童学习，晚上给社员扫盲，从此荒僻寂静的山村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碰巧，当时山下的公社高中设立了一门数理化三合一的课程，但他们缺少这门课的教师。于是，我便从山上的民办小学来到了山下的公社中学。还有一段时间，



2018 年校庆，施能民学长毕业 60 周年返校留影

全国兴起大唱革命样板戏的高潮，我便兼职到公社的村村寨寨教唱革命样板戏。一时间，我成了公社的知名人士。

为了搞好宣传，公社规划建立遍布整个公社的有线广播网。我展现出专业能力，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从设计、制作、调试到安装布线的任务。使公社的村村寨寨随时能听到北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

接着，公社想在有丰富水源的地方建设水电站。具体任务包含勘测、选址、设计和指导施工。公社书记说：“这事儿就指望你了！”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因为建一座水电站需要水利、土建、电力的综合技术，而我只是擅长电力的一小部分。但我凭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凭着在清华园积累的数理化知识的功底和工程制图本领，我开始学习、钻研水电站的理论知识。我参观了龙岩地区已经建好且在运行的中小水电站，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始勘测、选址和设计，指导现场施工，边学边干。经过和广大社员一起奋斗了三年多，先后建设了5座小型水电站，解决了生活照明及农产品加工用电的动力需求。这片荒僻的山野也闪烁出电气化的光芒。

1978年，春天再次降临神州大地，我的政治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我又可以在教育战线大展身手了。然而，在我获得平反、踌躇满志地工作了9年后，不幸降临了：1987年7月我得了腮腺癌，我耳腮后的病灶被切去后，造成整个脸歪斜，两眼一大一小。但我不惧丑陋，术后三个月便毅然重登讲台。学生送给我一个“昵称”叫“歪嘴和尚”，但他们说“歪嘴和尚念出的倒是正经”，这也是对我讲课的肯定。我也两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



2009年，施能民学长随“福建省榕树合唱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世界合唱比赛，荣获金奖

常言说“祸不单行”，1989年2月我又得了晚期胃癌。发病的当天，我胃中病灶部位的大动脉破裂，鲜血从口中喷出，顷刻间我已陷入昏迷，急忙送往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抢救。大夫切腹观察，发现胃癌病灶有鸭蛋大小，切片化验全是恶性，主治医生认为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在我的家人强烈要求下，主治医生切除了我的全部胃和脾以及胰腺的一半。即使是这样大面积切除，病情达到如此严重程度，医生还是向家人提出“该患者的成活时间不会超过3个月”的警示。我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曾记否，在清华园里，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和信念：“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痛苦的化疗使我几乎失去了正常人大部分消化功能和存储功能，每餐的进食绝大部分都被泻掉，我只能靠流质食物少吃多餐以维持生命。我专门观看振奋人心的电视新闻，聆听优美的歌曲，参加合唱团歌唱，根据身体情况做不同的运动锻炼，并不间断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充实的生活和乐观愉悦的心情，长此以往，

## □ 值年园地

奇迹竟然出现了：我从3个月的成活期一直到如今，健康生活了30年。而今，我每天坚持游泳800米，能一次不停歇地给学生做三小时讲座，体重从76斤恢复到98斤。在这与癌症抗争的30年期间，我曾先后获得福建省和福州市以及环保部科技二等奖和三等奖。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福州大学老教授协会的工作。根据在清华三年多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和四十年的教学工作经验，特别注重做好育人方面的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走好人生道路，因此被福州大学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15年受到中国老教授协会开展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活动评委会的表彰。

我依靠在清华大学音乐室和清华大学合唱团练就的歌唱本领，随“福建省榕树合唱

团”先后到过曼谷、悉尼、维也纳、香港和台湾演出，为弘扬中华文化而高歌。

截止到目前，我已成为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晚期胃癌成活最长和五脏不全成活最长的病例。我已经和福州市红十字会办好了遗体捐赠手续，在我去世后，我的身体将奉献给医学研究，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如今，我继续做力所能及的教书育人工作，继续圆我的教师梦。2016年，我加盟清华海峡研究院，正为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工作。

从清华毕业已60周年，回眸逝去的时光，有太多的坎坷，又有太多的幸运，从某种角度说，我此生一切源自清华，我的心也将归于清华。当我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我意识里最后闪现的一定是“我的清华，勿忘你、感谢你！”

## 忆校园三则

○ 梁铁汉（1958届土木）

### 听杨式德老师讲课

在学校学习，以听课最为辛苦。上世纪50年代，教材不完善，除了一些不太成熟的油印讲义，就全靠课堂笔记了，因此，听课就成了最费神、费力的事了。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听杨式德教授讲“结构力学”课，费神和费力之外还是一种享受。

电铃一响，课堂安静下来，杨老师先写大标题，这是一堂课的内容，接着就一边讲一边按大节标题、小节标题，逐节推进，条分缕析。每一节的内容写在黑板上，这时一边听，一边理解，还要赶紧记

下。因为这些具体的详细内容，或者公式的推导，会随着讲述下一节时擦去，黑板容不下这么多内容，留下的只是标题。这种听课方式在中学是没有的，大学一年级时很不习惯，往往手忙脚乱；到学专业基础课时，眼疾手快，已经习惯了。尤其是杨老师讲起课来不紧不慢，不是神采飞扬，也不幽默风趣，而是娓娓道来，恰似一泓清泉，汨汨流淌，沁人心脾。内容难懂的，他会重复一遍，重点强调一下，你得赶紧记下和打上扛扛。他还会将声音稍稍提高，语音也就显得抑扬顿挫，会使你精神高度集中，既不会跑神，更不会昏昏欲睡。